

李维桢集序的《诗经》构件与应酬书写

周 荣

摘 要 李维桢集序文本中反复出现聚集《诗经》相关知识且遵循相对稳定表述程式的文字单元,可称之为“《诗经》构件”。李氏以《诗经》为本经的科考经历和学术兴趣,使其对《诗经》知识极为熟稔,并成为其在应酬语境下快速高效地撰构出合格集序的重要保障。《诗经》知识作为一种标准化书写装置被李氏植入集序的文本构造中,位于篇章首、中、尾的一处或多处,又与其他构件组合勾连,发挥入题、展开、转折、收结、呼应等作用,极大影响着序文撰构模式和行文策略。李氏常借助各类《诗经》构件完成诗学思想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复古诗学、性情诗论和楚地文学等方面。但构件的程式化组装和集序的批量化生产,又消解着其文学论评的严肃性与真实性,故应审慎辩证对待其序文所蕴含的文学观念或作品评断。这一个案提醒我们,在研究近世诗文时,应关注古人文章写作的知识要素和模件化叙述,不忽视交际应酬的文化语境,注意文献材料的生成背景与适用限度。

关键词 李维桢集序;《诗经》构件;明代诗学;应酬语境;文体学

中图分类号 I206.2;I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5-0189-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253);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413000253)

李维桢集中存有丰富的集序文^①,主要包括别集序和总集序。所谓“《诗经》构件”^{②[1][2][3][4]},指集序文本中凝结《诗经》相关知识、具有相对固定表达模式的文字单元,具体包括《诗经》文本片段、相关经学阐释或其他拓展话题。李氏常拼贴各类《诗经》知识组织文本,这表明运用《诗经》话语作为书写构件,已然是其序文撰作的常规方式和重要环节。《大泌山房集》等收录序跋甚丰,其中包含《诗经》构件者达 80 余篇,足见其使用频率之高。目前关于《诗经》构件的研究,仅有以清代集序为对象的探讨^[5],明代相关议题仍有开拓空间。

明清集序中《诗经》构件的大量涌现,与近世《诗经》教习的广泛施行密切相关。科举制度下《诗经》学知识的普及与下沉^[6],自然会逐步渗透至文学创作层面。李维桢出身于世代研习《诗经》的家族,父兄俱以《诗经》为本经。其本人幼承家学,于隆庆二年(1568)以《诗经》高中进士,后又持续参与《诗经》编刻、研究活动。既有研究指出,本经修习所形成的知识储备与思维习惯,会深刻塑造士人的文学行为^{③[7][8]}。于李氏而言,《诗经》构件已不限于引经据典层面,而是内化成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和文章结构方式,这正体现了其对所学知识的创造性转化。在具体写作中,李氏展现出对《诗经》文本与阐释传统的高度熟稔,其《陈将军诗序》采《诗经》中关于兵家武事的典故融液成文,《为薪草跋》则几乎囊括《诗经》中所

① 题跋作为序文的“亲缘”文体,在适用对象、功能、写法等方面与序相近。本文结合具体情况,在考察集序时亦会涉及少量集部题跋。

② “构件”或云“模件”是雷德侯论及中国艺术生产时使用的概念,近年来被本土学者徐雁平、王润英、颜子楠等引鉴,用以分析中国古代的序文与诗歌文本。本文关于集序构件的定义、研究方法受到诸人启发。

③ 如钱谦益自幼研治《春秋》,影响《列朝诗集小传》中春秋笔法的运用;陈子龙科考研习《诗经》,促进其诗文“博综风雅”面貌的形成。

有关涉“薪”的诗句及注疏。从序文所取的经学意旨来看,其《诗经》学知识结构颇为驳杂、储备极为丰赡,常溢出举业规程,旁涉三家诗等传统^[9](11册,P604)。基于此,本文聚焦《诗经》构件作为结构形态、诗学载体与应酬工具的三重属性,由内而外依次探讨李维桢集序的撰作模式、诗学思想及交际书写等问题,以期为观察明人读写实践提供新视角,并借助文本细读与语境还原,尝试推动明清诗文研究的精细化开展。

一、《诗经》构件的分布组合与集序撰构模式

李维桢集序中构件的《诗经》运用方式大体有三种:一是称名,即论说过程直称《诗经》总名或篇名,多以“《诗》”“《三百篇》”等为标志性字词;二是直引,即直接征引经典文本或圣人语录,如“《诗》云:……”等常见模式;三是化用,即融会点化经传所涉语辞、义旨及史事典故,并将其缀连于行文之中,如《株守吟序》便连续化用《大东》《桑柔》《召旻》等篇的词句。构件内容除诗篇章句及后世阐释外,最常见者当属孔子论《诗》语与《大序》文本。在一般的知识性征引之外,亦不乏构件在集序立意构思、谋篇布局方面发挥作用的情况,即其作为一种写作方法而存在。此情形下,集序中的《诗经》文本不再是传统经典知识的简单重现,而是作为标准化的书写装置被放入集序的构造之中。此类构件关涉文章写作模式与行文策略,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以构件在序文中的位置分布、组合情况为突破口,可清晰把握其文本功能。

(一) 单一位置型

《诗经》构件常集中出现于序文的某一固定位置,其文本功能与修辞意图亦因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大致可分为数种情形:

其一,位于篇首。热衷于在开篇引经据典,这或与当时“文本六经”的认知有关。与篇中、末相比,这种情形最为普遍。征经援圣是集序写作快捷的切入方式,暗示作者诗文具有“得之六经”的优秀品质,在篇首便为全文设定“崇高性”基调。起首的《诗经》话语作为进入正题的“帽子”,能为衔接的论说留出更多空间,起到引出下文的作用,如《李少保诗序》开篇即云“昔者孔子删《诗》,所存十五国风,即出于闾巷妇孺之口,为万世经,东南无一焉”^[9](8册,P456),以此作为简短导语,引入地域文学的历史变迁问题,为后文强调明代北方文学复兴铺路。又如《汪汝任诗题辞》开篇列孔子论《诗》语,便于引出下文集作者赓续赋诗传统的相关论说。

开篇亦常利用《诗经》学史重要命题立意谋篇,《据梧草序》以“诗史关系”为立足点推衍成文,篇首即云:“王仲淹曰:‘仲尼述史者三焉,《书》《诗》《春秋》是也。’此其说盖祖孟氏。孟氏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9](8册,P459)显系结合集作者郭正域的史官身份,借“《诗经》《春秋》关系”“以《诗经》观史”等话题谋篇布局,并将此立意贯穿至文末。又如《李民部诗序》确立“雅”为中心论题,开篇引《诗谱》等辨析“雅”概念,并以之为关键词提摄全篇。

其二,位于篇中。这种情况更能体现构件在篇章结构方面的枢纽作用,或转折、或过渡,或疏通筋脉、或制造波澜,数句便使全盘皆活。如《宋元诗序》开篇阐明宋元诗逊色于唐且遭时人厌薄的现状,并坦言其本人亦“沿习尚,不以宋元诗寓目”。一味贬抑自然不是序本意,故文章中段运用构件转折:“久之,悟其非也,请折衷于孔子……”指出孔子删《诗》尚且不废“淫诗”,存之以观政察俗,故宋元诗至少亦当有反映现实的价值:“宋诗有宋风焉,元诗有元风焉,采风陈诗,而政事、学术、好尚、习俗、升降、污隆,具在目前。故行宋元诗者,亦孔子录十五国风之指也。”^[9](8册,P235)经此过渡,序后半段进入宋元诗内部去分析风格特征,也显得更为自然,且最终指明宋元人亦未偏离学唐轨道,表达了部分肯定。李氏利用构件设计转折结构,从鄙薄转至正视,虽依旧不乏微词,但整体上起到欲扬先抑的效果。

又如李氏为辞赋集所撰的《江妃赋跋》,开篇引刘勰言强调赋咏美人的要求,并盛赞作者文采斐然、得屈宋要领。行文至此尽属称赏之语,若下文继续如此,文章便显得平熟甚至虚伪。于是在篇中段尝试调整节奏,以对话方式生发新话题,即辞赋正统性问题,其云:“或曰:屈、宋诸君坐是为儒者诟病,邇而效

之,无乃不可乎?”而其答语则全系《诗经》知识,举例论证《诗经》中不乏与屈宋赋相似的艳语,得出“赋者,古诗之流,屈、宋诸君盖昉于此”的结论,篇末则转换至佛教相关内容^[9](11册,P595)。此处构件的引证,在内容上以《诗经》为辞赋张目;在结构上成为全文凸起的“非稳定因子”,让肯定辞赋的整体基调浮起一层波澜,具有起伏跃动的效果,在文思曲折中传达出撰序者意图,而对话模式的使用,亦颇具往复论辩之意,防止文章板滞。

其三,位于篇尾。李氏常以构件在篇末总结全文,如《魏太史游滇诗序》前部分陈说作者家世显赫、仕途顺畅,并着重介绍其史官身份,于篇末归纳云:“显伯意无不畅,道无不通。诗法源出《三百篇》,有颂而无谄,有风、雅而无变,则其所遭遇,过子长远也。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唐人亦有‘诗史’之目。显伯负良史才,绍明《春秋》,余不敏,于其诗窃窥大略矣。”^[9](8册,P472)便以《诗经》构件绾合前文提及的各要点,并进一步点明其诗作风格。在篇末升华主题的例子亦有不少,《王尔耳宫词跋》篇末从《诗经》“六义”讲至词体“六义”,并希望其词作能像《诗经》一样为官方采录。相较于正统诗文,词处于边缘位置,而与《诗经》建立联系自能提升其文体地位与品格。又如《选诗补序》,文末将刘寅等编纂《选诗补》与孔子删《诗》相提并论,抬升其补编行为。

李氏亦常在文末突破前文论说藩篱,增衍新话题。以《诗经》褒扬他人是常用方法,如《董司寇诗集序》文末大量胪列《诗经》知识,用以表彰作者“诗本《三百篇》”“深于《诗》”的优点。但前文并无相关铺垫,篇末夸饰略显生硬、脱节,这种结尾或为写作套路,但确对全文话题有所延伸。又《落花诗序》篇末借友人口推扬集作者:“吾今乃知公之深于《诗》也。远之事君,授之以政而达,盖有自来。”^[9](8册,P470)语句亦化自孔子论《诗》语。篇末称誉往往是一种期许与鼓励,颇能突破篇幅限制,拓展思绪的疆域。

(二) 多处位置型

篇幅较大的构件更易被单独使用,而体量较小者则能在文中穿插自如、随处点缀,起到入题、黏合、过渡等作用。“流动性”是构件重要特征,《诗经》话语作为“浮动”的文本,在集序中不会完全固定于同一位置。李氏会据撰文需要,将若干简短的小插件灵活放置于多处,在整体上又能组合成大构件,形成多元化的组构模式。

首先,“前—后”模式。李氏擅长利用构件设计文章的首尾照应。如《王先民诗序》篇首引《荀子》称伏《国风》的言论,篇末又论及“风人”,两处文字篇幅均较短小,但在结构上遥相呼应,用以褒扬作者诗歌近《国风》的特征。又如《王景圣诗序》篇首讲述历代《诗经》教育情况,篇末结合王氏教谕身份,又回归至教习话题,将王氏比作汉代传授《诗经》的博士,前呼而后应,结构上形成完整闭环。又有选取一两句诗起头,作为线索深埋,并在文末再次显现的案例。《株守吟序》开篇云:“《诗·小雅》曰:‘伐木许许邪。’许者,举重劝力之歌也。”^[9](8册,P479)文首用诗句及朱子解释作为引子;中间段由“伐木”进入“征木”话题,细论历代因营造宫室而采木之事,尤其批评嘉靖以来大举征木的苛政;文末回到《诗经》,引《伐檀》《北门》等刺政恶、恤民疾的诗篇,并化用《诗经》语句表达盛世期望作为结尾。《伐木》本非刺诗,《小序》《诗集传》均释为“燕朋友故旧”,但李氏于此仅取字面意义^①(P384-386),指出“伐木许许”系“举木者歌以相劳”场景,可反映民众劳苦,故成为关联线索贯穿始终。《诗经》话语虽集中出现在前后两端,但中间部分隐隐串起首尾思绪。从“征木”话题到讽刺苛政再到祈盼仁政,进而凸显诗集的现实价值,俱从“伐木许许”生发而来。全文顺水推舟、层层展开,结构自然顺畅。这已非简单的首尾呼应模式,而是颇具从小至大、由浅入深的层次感。

其次,“前—中”或“中—后”式。前者如《刘宗鲁诗序》,开篇云:“孔子论《诗》曰:可以兴观怨群,迺事父、远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诗亦何所不备?”中间介绍完集作者基本情况后,便呼应前文:“而宗鲁

① 宇文所安指出早期诗歌对《诗经》的引用常仅据字面意义而非训释传统的深层含义,即作为一种“习惯性引用语”的存在。这种脱离原生语境的套语在李维桢构件中出现频率较低,其更重视诗句文本在阐释系统中的深远意义,并强调构件在序文结构、意涵方面发挥的实际作用。

诗独出入唐人,草木鸟兽,辐凑于楮墨间,即忠臣孝子之旨,与其可兴观怨群者,亦自有之。”^[9](8册,P522-523)可知此类模式常于开篇引入构件,篇中结合作者具体情况接引篇首,篇尾则转入其他话题。后者如《文蓝馆诗序》,篇首系作者的生平介绍,构件难以插入,至篇中则另起一话头,用《诗经》与陶渊明的例子,说明诗道并不排斥“理学节义”,文末则接应此论点:“假之数年,由柴桑而进《三百篇》,将理学节义不得觭重孟弢,而况直以富丽雄奇名孟弢诗也?”^[9](8册,P494)此安排使集序论诗部分与篇首传记性文字形成双峰并峙的结构,更能凸显出作者诗歌的个性特征。这类构件的排布形成局部关联样式,能促进文章结构的多样化。

最后,“前一中一后”模式。这种情况下,构件起到勾连全文、贯穿始终的作用。如《自可编序》围绕诗集名“自可”中的“可”字立意,因联想到孔子评子贡、子夏“可与言《诗》”的言论,全文前、中、后便均以此文字单元进行串联,主题明晰,浑然一体。又如《唐诗纪序》全文可分为三部分:起始为常见的“声音之道与政通”言论,说明能借《诗经》观世之污隆;中间起手指指出“然而以《诗》论世易,以唐诗论唐世难”,从作者身份、是否入乐等角度指出二者差异;末端则纵向论述《诗经》、汉魏六朝诗及唐诗的源流兴衰,表达尊崇《诗经》的意识,最后不忘感慨“由《三百篇》以来,得失之林,较然甚著”^[9](8册,P229-230)。序文“主角”虽是唐诗,但全文前、中、后均不乏《诗经》话语隐现,以《诗经》作为辅助或参照,使文章更加浑然紧凑。

(三) 构件组合型

上文所论构件的编排,多限于《诗经》一类。其实《诗经》构件并非界域严格固定的文本单位,常与其他文字交织。李氏为祛除文程式化痕迹,常将不同构件组合使用:或将《诗经》知识插入其他叙事模式,或将其他内容板块嵌入《诗经》构件,使文本编织得更为复杂精巧、结构愈加立体多维。

与明清人常用的“地域文学构件”相组合,显然最具代表性。李氏常将与十五国风相关的《诗经》学内容镶嵌进地域构件中,如《王芻叔诗题辞》整体上是地域文学的叙事模式,旨在强调作者赓续齐地文学传统,但开篇即点明“《诗》分十五国风”,篇末又云“因评芻叔诗而及之,以备夫续‘齐风’者考焉”^[9](11册,P620-621),《诗经》构件的引入使文章内涵不再单调。又如《汪敬仲诗序》亦属地域文学的叙述类型,意在说明作者久游齐鲁而诗亦具齐鲁风格,文中穿插以《诗经》构件:“余惟孔子自卫反鲁,删诗正乐,《雅》《颂》各得其所,遭秦坑焚佚亡,而齐、鲁人如申公、辕固者,独得其传,于今赖之。”^[9](8册,P564)后又引齐人王叔武、李攀龙论《诗经》之语,增加此线索目的是推崇齐鲁地区的风雅传统。两种构件的紧密融合,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写作的套路化。

集序写作本质上是命题作文,当题目(书写对象)相近时,调整文中构件的组合是规避重复的常见方法。陈性甫诗集《唱喁稿》与梁莫宸诗集《唱喁草》,二者集名相同,李氏撰序时均采用《庄子》与《诗经》构件,二文节录如下:

(前)天籁地籁,盖言风也,风岂专为不平故耶?山林畏翠,大木之窍不同,而风声随异。宁惟林木,凡触而成声者皆然。有平有不平,物所自受,而风何与焉?程大昌谓《诗》有《南》《雅》《颂》,无《国风》。……(中)戛而若激,疾而若謫,粗而若叱,细而若吸,高而若叫,下而若謔,深而若突,切而若咬,诗莫不有之。物无万数,而致则一。吾见性甫之以平,平其不平也;未见性甫之以不平,失其平也。性甫诗,诚风人哉!……(后)性甫之以“唱喁”名诗也,处其后不处其前,一洗文人矜夸之习,固宜善鸣若是,是可以风矣。^[9](8册,P536)

(前)《诗》有六义,风居一焉。说风者莫善乎庄生,天籁人籁是已。夫十五国之风,大都出田野闾巷匹夫匹妇之口,莫知其然而然……(后)抑庄生有言,风之积也不厚,则负大翼也无力,而后乃今培风。莫宸积而培之,御之旬有五日而返,搏之九万里而上,不佞顺下风而进拜耳。^[9](11册,P551)

二文均围绕关键概念“风”运思撰文,《庄子》与《诗经》话语的组合占据了主要篇幅,两者分别对应“自然之风”和“十五国风”,最终目的俱是称美集作者具有“风人之致”。在相同的主题立意下,如何生成有区别的文本,避免同质化叙述,显然是亟须面对的写作问题。据文集名“唱喁”主题词可知,《庄子》构件当为主体。李氏通过调整构件体量、变换组合次序来实现文本面貌的多样化,而《诗经》作为辅助性插入元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李氏努力经营,二文在细节上亦呈现出诸多差异:前者两种构件被打散后更显破碎,行文过程中交叉使用,融合度更高,后文单体构件的使用更为完整,组合顺序大体是先《诗经》后《庄子》;前者构件贯穿于前中后三段,后者主要是首尾呼应模式;前者又涉及其他话题模块,引入“不平则鸣”诗学构件充实全文,后者则更为单一。随着各构件“利用率”的提高,序文模式化、趋同化的问题在所难免。但诸例表明,李氏亦在竭力避免文本雷同。此外,“楚辞”“唐诗”“穷而后工”等话题亦常作为配合使用的构件。《诗经》与相关构件的排布组合,在结构上形成多线并进的叙事格局,集序亦成为具备多重话语维度的“复调式文本”。

二、《诗经》构件与诗学主张的构筑

《诗经》构件在集序写作中不仅作为结构要素参与文本组织,亦作为意义载体传递文学思想,成为李维桢表达诗学观念的重要助力。《诗经》作为经学与文学的双重经典,其思想内涵及衍生知识已积淀为后世重要的文化与文学概念,为论说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在撰序过程中,诸话题常自然唤起并衔接撰序者既有诗文观念,成为其表达文学主张的现成框架。李氏亦循此理,相机在行文中安排其文学批评主张,集序中反复出现、叠次申说的文字单元,多是其业已成熟的文学理念。在这一意义上,《诗经》作为旧典在新语境下被不断激活,成为其输出既有观点的文本媒介。通过归纳集序构件涉及的《诗经》学主题,梳理由此生发的诗学议题及适用场景,可进一步了解各构件助益李氏表达诗学观念的具体过程和一般规律(详情见表1)。

表1 《诗经》构件知识主题及运用场景

构件主题	具体内容	适用文学场景	篇目举隅
《诗经》作者与作法	周公、孔子删《诗》	认可诗歌包含“理学节义”	《文蓝馆诗序》
	《诗经》为“圣贤发愤所作”	强调“穷而后工”	《李成白诗序》
	讨论《诗经》的修辞技巧	诗宜触情而出、即事而作,批驳当下抄袭风气	《王吏部诗选序》
《国风》话题	《诗经》分十五国风	论文学地域特征	《李少保诗序》
	《国风》虽出自民间,但经学者修润而成	强调学问对诗的重要性	《玉光斋诗草序》
	《国风》出自细民妇孺之口	论诗当本于性情	《潘方凯诗序》
	“《国风》好色而不淫”议题	表彰女性诗作	《百一诗引》
	《国风》作者半为巾帼	讨论诗中儿女情	《王先民诗序》
《诗经》与现实社会	“声音之道与政通”“陈诗观风”话题	申明诗歌具有反映政事风俗的作用	《宋元诗序》
	“赋诗言志”“四方专对”等话题	主张诗歌应运用于现实政治	《汪汝任诗题辞》
	孔子“兴观怨群,迩事父,远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	强调《诗经》学全备,作诗应读书穷理、广博知识及关怀现实	《刘宗鲁诗序》
	“温柔敦厚”《诗》教	申言儒家正统诗教的重要性	《张仲骏诗题辞》
《诗经》与《楚辞》	二《南》与“楚风”之关联	揄扬或建构楚地文学传统	《吴昌侯诗序》
	《诗经》与屈宋辞赋的联系	推崇《楚辞》地位	《郭原性诗序》
《诗经》与后世诗歌	始自《诗经》的诗体源流正变	梳理诗歌宗尚脉络,建构文学史	《青莲阁集序》

据表1可知,《诗经》极强的理论延展性使其成为诗学资料库,构件涵摄的知识要素兼顾文学和经学,能满足李氏构筑诗学体系的基本需求。李氏的文学主张并不以新奇、深刻和系统著称,不少实为文学史

上的老调重弹。有鉴于此,考察重点不在于观点本身是否具有原创性,而在于其表达主张的具体过程。有研究指出,“李维桢的诗学理论,建立在诗歌源头《诗经》的基础上,大部分观点都据《诗经》来申发立论”^[11](P321)。<《诗经》构件在其诗论生成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被有倾向性选择使用者,显然不容忽视。因此,不妨以李氏反复申说的三大诗学论点为例,考察其如何利用各构件完成核心诗学的建构与巩固。

(一) 复古诗学:《诗经》符号与“复古仪式”

李氏被王世贞纳入“末五子”之列,始终恪守复古派的基本立场,这已是学界研究共识。七子派一直高度重视作为古典诗歌起始的《诗经》,复古诗学的取法序列亦通常会上溯至《诗经》。李氏具备明确的复古派身份意识,常把以《诗经》作为领头的诗史话语当作书写构件,表达文学复古诉求。其认为《诗经》系最高宗法对象,对后世各诗体而言均具典范意义,如《游太初乐府序》等即将《诗经》视作乐府源头。其又以《诗经》为最高标准评价历代诗人诗作,如认为尹于皇诗“祖《三百》,宗汉魏,奥庾六朝三唐”^[9](8册,P534),指出唐尧官诗“出入汉魏、六朝、三唐间,而大指道性情,归极于《三百篇》”^[9](8册,P319)。类似例子,不一而足。李氏通常会围绕古典诗歌的兴衰演化及宗尚脉络作一番勾勒,如《题曹荩之诗后》云:“诗自《三百篇》而后,骚、乐府、古选次之。骚盛于楚,汉能继响,至魏亡矣;四言盛于周,汉变为五言;又变骚为乐府,魏、六朝能继响,至唐而皆亡矣。”^[9](11册,P599)这类诗歌史的简略梳理在其集序中颇为常见,但《诗经》总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或可视为其基于复古立场,对《诗经》传统所作的仪式化回望与致敬。

在勾画以《诗经》为标杆的诗歌演化框架时,李氏会将自身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判断融入其中,形成具有复古色彩的诗歌宗尚序列,当然相关主张多是晚期复古派内部的共识性观点。如《诗经文简草序》云:“《三百》而后,最近者汉魏,其次唐,其次明。”^[9](8册,P599)《唐诗纪序》云:“后唐而诗衰,莫如宋,有出于中晚之下;后唐而诗盛,莫如明,无加于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昆仑也;汉魏六朝,龙门、积石也;唐则溟渤、尾闾矣,将安所取益乎?”^[9](8册,P230)李氏强调“《诗经》—汉魏六朝诗—唐诗—明复古派”的师法序列,将汉魏、唐代以及明代诗歌树立为承续《诗经》的三大高峰。这既是对当下诗歌的一种时代自信,亦是其在历史脉络中维护学古的正当性。

值得注意的是,李氏集序凡论复古几乎必提及《诗经》,相关序文至少有13篇。《诗经》构件已然成为其诗史叙述的标志性符号,亦是其维系复古诗学的权威工具,这既源于《诗经》自身的远古经典地位,又得益于明代复古派的集体认同。在复古诗学渐趋式微的背景下,李氏借此类构件持续强化其复古叙事与身份归属,其中大量机械式的重述,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越单纯的诗学阐论,转而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性、表演性且不乏坚守意味的文学仪式。

(二) 性情诗论:“真”与“正”的兼容

“性情”是李氏诗学的一大关键词^[12](P537-543)。晚明复古末流学古方法的缺陷,掩蔽了诗人真实性情的表现,故李氏在制衡学古的同时强调求真,重申诗之性情。其集序常利用构件申引这种观念,以独特方式赓续《诗经》性情论的传统。李氏首先关注的是《诗经》自然纯真、绝无伪饰的特点,其《王吏部诗选序》云:“余窃惟诗始《三百篇》,虽风、雅、颂、赋、比、兴分为六义,要之触情而出,即事而作,五方风气不相沿袭,四时景物不相假贷。”^[9](8册,P472)《潘方凯诗序》指出:“诗以道性情。性情,夫人所有。十五国风诗,或出妇孺之口……”^[9](8册,P545)该序通过强调《国风》的民间性,体认诗歌出于性情的本质。

由于李氏论性情本于《诗经》而来,具有鲜明的经学底色,故其性情观呈现出持中守正的特点,在强调性情之“真”时,亦未忽视其“正”的一面。《汉上吟草题辞》指出:“发乎情,止乎礼义,归乎温柔敦厚,一按而知其为王者皞皞之民也。”^[9](11册,P592-593)便是在强调诗应“止乎礼义”,并未溢出儒家诗教藩篱。李氏在集序中屡屡表达此种观点:《国风》虽出自民间,但经文人学者修润而成。此论融合汉宋《诗经》学观点,综合朱熹《国风》“里巷歌谣”说和《大序》“国史作诗”论。认可《国风》源自民间,旨在强调其“性情之真”;突出《国风》经周公、孔子或太史等的删定润色,则是在强调“性情之正”。《玉光斋诗草序》云:“《诗三百篇》出市井草野蚩氓妇孺之口,而采者修饰润色之,以成文章。猥云自然,便于听解,俚俗之语,令人

呕啜。”^[9](8册,P468)正是在重申修润者的推敲打磨之功,甚至警惕诗歌信口而出导致过于鄙俗的弊端。由此点延展开来,李氏借《诗经》阐论性情时,又常涉及“学问”要素。其基于《国风》经“学士大夫稍以学问文词润色之”的看法,在《读苏侍御诗》中提出“诗本性情,而缘饰以学问文词”^[9](11册,P546-547)的观点,指出诗当以性情表现为主、学问文词缘饰为辅。这并未如部分复古者极力排斥宋诗“以学问为诗”一般,完全否定知识学养的作用。

李氏借《诗经》生发而来的性情论,由《诗经》作为“诗”而启发出“情”,但又因“经”的约束而限于“性”。其性情的抒发是有节制的,并不能无视道德政教而一味追求个性解放。这种具有温柔敦厚特征的儒家诗学思想,虽削弱了“情”一端的突破性与先锋性,但确使其诗论在某种程度上更为丰实深邃。而正是大量《诗经》构件的融入,李氏性情诗论才能展现出如此浓厚的尊经色彩。当然,这种以《诗经》风教精神为基本宗旨的情感论,显然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本质不同。

(三)楚地文学:《诗经》《离骚》并论

李氏论地域文学,常以十五国风为基本框架,而作为湖北文人,其关注重心自然在楚地。在为乡邦士人撰序时,他屡借《诗经》构件建构楚地文学。一方面,通过《诗经》《离骚》两种构件的并用,凸显《楚辞》的文学史地位。如《据梧草序》极力推崇屈原人品和《离骚》文学成就,认为《离骚》可为“楚之史”,完全能与“《三百篇》提衡”^[9](8册,P459)。李氏又认为《离骚》乃《诗经》之变,强调《离骚》能弥补《诗经》无“楚风”的缺憾,继而申言其地位。这显然是以《楚辞》为中介,将楚地文学建构成赓续风雅传统的文学类型,推崇楚地文教诗脉的正统与悠久。当然,这种溯源在学理上能否站得住脚是值得商榷的^[13]。另一方面,李氏又从《国风》的地理格局推进至楚地文学。但棘手的是《国风》中并无“楚风”,故其利用《诗经》学知识指出:“楚声不隶乐官,然《江沱》《汉广》,二《南》风化在焉。美哉!始基之矣,勤而不怨,非楚之声耶?”^[9](8册,P495)他认为《诗经》虽无楚风,但楚地受到二《南》风化影响,楚声的成就不容忽视。关于此,其又进一步结合明代现实,利用二《南》的文化政治优势及嘉靖皇帝的“龙兴之地”展开论述。借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行政格局与《国风》“二南十三国”的巧合,加之嘉靖帝自湖北藩邸入京的事实,直接将楚地文学比附于二《南》诗。其云:“不佞观昔周道盛时,化行江汉,其诗为《召南》,出闾巷细民居多……而郢自嘉靖来,王风首善,比于《召南》。”^[9](8册,P502)《汉上吟草题辞》的论述更为全面,其具体逻辑是:二《南》中存有《汉广》《江有汜》等诗,可知周公、召公之教化施及江汉流域;嘉靖皇帝旧居于安陆兴王府,故楚地被视作“潜龙旧邸”“二《南》首善地”^[9](11册,P593)。周时江汉之地得周公、召公教化,明时楚地则有世宗之文治王化,具备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依据。以明朝江汉地域文化接续周、召盛世之风,暗示楚地文学接续二《南》传统。类似论述,亦见于《和雪亭诗序》《郢人语序》等。《诗经》构件在此使地域文学的建构方式更为多样,促成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的多重交织。

“《诗》无楚风”在《诗经》研究史上几近公论,李氏承认这一共识,但又坚持认为《离骚》即为楚风,只是未能经孔子采删而已。他又敏锐地捕捉到二《南》诗或涉及江汉流域,“南”即为南方区域,故基于地理知识将之与楚风建立联系。此论来自《诗集传》,朱子之说则可远溯至汉人。但该说法并非定论,“二南”本义历来聚讼纷纭,如郑玄判定其地处岐山之南,杜预等晋以来的学者则释其为乐名^[14],均未与楚地关联。以李氏广博的《诗经》学知识储备,不至于不了解有关争议,可见他是选择性地使用或有意误用相关知识,目的是借《诗经》揄扬楚地文学。

三、应酬语境下《诗经》构件背后的诗学重审

晚明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15](P276),这体现出当时刻集普遍和集作者身份下移的现象。与之相伴而生的,是集序书写极度盛行并逐步应酬化的态势。明清集部文献迅速膨胀,集序写作随之步入规模化产出阶段,《诗经》因其社交属性,在相关文本组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若以晚明应酬语境下的构件运用为切入点,能发现李维桢集序书写具有“批量组装”的特征。基于此,程式化的构

件能否代表其文学主张便值得怀疑,集序所承载的文学观念是否真实可靠亦须辨析。故应审慎对待由构件参与的文学活动、组构而成的文学论评,特别是出现频率不高的论点。

(一)“以供应酬”:作为社交工具的《诗经》

李氏官位显赫,又为文坛盟主,在晚明声名隆盛。他交游广泛,曾辗转多地为官,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人情应酬性质,其谈及当时士风云:“比入官,取功名富贵之途多端,于诗稍染指,以供应酬而已。”^[9](8册,P475)向他求序者不绝如缕,史载:“维桢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16](P7386)检视其文集,可见其集序的社交色彩甚为浓厚,且绝大多数是为他人作品所撰。其中既有为熟识者撰写的篇目,亦不乏友人作为中介牵线索文的情况,如《张仲骏诗题辞》《逍遥园集序》等即属此类。通过社交性质的序文写作,李氏不仅能获取丰厚的润笔费,更能以之提携新秀、团结同好,进而构建社交网络。

在应酬文需求量激增的情况下,如何快速高效地写出一篇得体序文是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拼装构件是明人常用的应酬写作之法。至于选择何种知识构件,则与个体知识储备有关。唯有迅速调动脑海中最熟悉的知识和经验,方能速成符合要求的文章。对于长期浸润于《诗经》研习的李维桢而言,《诗经》显系其重要的知识储备,如同资源库一般可供随时调用。《诗经》构件的熟练应用,为李氏在具有应酬性质的集序写作中提供着程式化便利。特别是直接搬运大体量的构件,能使应酬写作更为省时省力,如其为王可学诗集所撰序文,挪借的《诗经》相关文字便占据了过半篇幅,能看出速成、敷衍的痕迹。而在不同语境下反复搬用相似构件,虽简便快捷但难掩粗疏之弊。如其《随在集序》,文本面貌与前述《唱喁稿序》《题唱喁草》两文高度相似。不仅以“风”为主题立意,亦存在《诗经》《庄子》构件重复利用的情况。如果说前两部诗集因书名相同,李氏通过“唱喁”之名勾连起《庄子》论“风”语,牵扯出《诗经》中“国风”“风教”等话题,尚有文本层面的关联。但此文仅据集作者为鲁人,便与《诗经》《庄子》建立联系,颇有牵强之感。尤其是在篇首介绍完作者事迹后直接转入“风”的相关论述,更显突兀。李氏与作者潘士美并不熟知,可以推测,此文极有可能是挪移前两篇构件组合而来的应酬之作,故而潦草粗率。大体相同的构件在不同篇章间反复套用,乃是应酬书写的极致化表现。此外,李氏集中不乏充满空话、套语的序文,如《潘无隐诗赋序》大量复述《诗经》知识,很少涉及具体内容,读者很难发现针对书籍、作者自身特点的有效信息。

除个人知识结构外,《诗经》自身特性亦成为其被用作应酬工具的原因。随着近世以来《诗经》世俗化与民间化的演进,其受众较以往更为广泛。《诗经》系明代科举中最受欢迎的选考经典,现存各种举业用书多达百余种,诸书提供着丰赡的《诗经》学知识。《诗经》及其阐释体系不再仅是少数精英掌控的经典学问,亦成为广大士人阶层共享的公共知识。明代文学流派纷繁复杂,各有宗法对象,但《诗经》始终是诸派均无异议的诗歌典范,拥有崇高的诗史地位。撰序者在写作中常表现出自觉的读者意识,力求兼顾集作者、潜在读者等多方主体的期待,尤其致力于让作者得到更多的认同感与精神满足。《诗经》显然是各方均能理解的知识和认可的权威,以之作为集序的书写构件,遭到不同群体排斥的风险显然更低。得益于《诗经》的悠久阐释史及丰厚内涵,操觚者似乎总能寻得其与集作者的共通处,并将其作为写作的突破口或链接点,为集序阐说提供理论支撑。如《李少白诗序》论及《召南》出自“闾巷细民居多”,正是用来证明布衣诗人的作品不容小觑^[9](8册,P502);《编蓬集序》讲述“大师教瞽蒙六诗”的历史,则是以之比拟盲人作者唐汝询的诗歌写作行为^[9](8册,P569)。在尊崇《诗经》的社会氛围中,能与之产生联系,对诗集作者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殊荣。而作者是否实际具备集序所描述的特点,显然已不重要。只是过度美化会导致评价失真,此时《诗经》便会完全沦为褒扬他人的交际工具。

以《诗经》作为应酬之具撰写序文,亦是与其他序作者交流对话的方式。李氏尤其重视与前序者的人情关系和写作伦理,一书多序现象体现出文学交往复杂化的过程^[17](P92)。如其在万历二十九年

(1601)曾为张之象《唐诗类苑》撰序,多处用到《诗经》构件,从《三百篇》“多识”传统关联“咏物使事”的诗道,进而为这部唐诗类书张目。是书万历十四年(1586)刊本存有王世贞等人序文,其中不乏《诗经》构件的运用,如王世贞序论及《诗经》求“博”特征,李自奇序用《诗经》知识引入诗学史梳理,卓明卿序以《诗经》证明孔子亦不排斥“类”。诸人均尝试将所序著作与《诗经》建立起联系,称赏其作为学诗类书的优势,而李维桢显然阅读过各前序文本^[9](8册,P230)。李氏作为王世贞亲命的复古后继者,对王氏尊崇有加,其序中《诗经》构件的使用更像是一种呼应和对话。《诗经》作为共同话语,成为诸人共享的知识符号,亦是同盟身份的体现。当然,李氏集序构件的切入点在“咏物使事”上,这种差异或许是规避重复的考量,亦反映出其对构件灵活掌控的能力。

(二)解构与反思:应酬背景下的文学论评

如上所述,李氏《诗经》构件的运用具有一定的人情社交意图,故集序所承载的文学思想亦不再纯粹。对李氏而言,构件能助其快速完成写作、建构核心诗学命题;但对后世研究者来说,正是大量模式化构件的使用,促使我们反思其文学活动的严肃性。研究者当谨慎对待集序包蕴的诗学观念或批评,注意相关文本作为研究材料时的适用限度,以解构的眼光审视之,再深入反思已有研究。

首先,对于常被学界论及的某些观点,我们不妨重新思考其产生的具体语境,以求能从不同角度予以更全面深刻的理解。例如,折中是李氏诗论思想中的重要特色,当代学者对此已有论述^[18]。这种由集序文本总结而来的融通性诗论,以往会将之与李氏在文学史上“过渡”“转变”的历史定位联系起来,这固然是其在反思复古派局限和借鉴时人观点基础上形成的复合思想,与当时师古、师心思潮交汇的历史背景有关,但或许更直接地与应酬写作的语境密切相关。李氏利用《诗经》这一颇为保险的工具进行社交性质的写作,本身具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撰文心理,不仅不能见罪于人,更要尽可能满足多数人需求,其论说自然不能过于尖锐或极端。因此,其在集序中常会陈述不少低风险的套话,或是致力于调和、化解各流派的文学争论。集序中谈诗说文的部分成为一种交际诗学,具备足够的灵活性与普适性。这显然是从文体功能与话语策略出发,理解其折衷诗论的新角度。

其次,某些出现次数不多且前后矛盾的观点,往往是在特定应酬语境下产生的,若以之归纳其文学观、研究其诗学思想,显然是有风险的。有研究注意到李氏在论述唐诗地位、诗史关系时,显露出的种种矛盾与模糊^[19](P62-63)。其实,这与其在不同论述构件、不同应酬语境中表现出的差异有关。例如,其集序对公安派的态度似乎存在抵牾,这点今人已经发现。有学者指出李氏偏袒前后七子,对公安派的指责极为严厉^[20];但又有学者认为其对公安派颇为暧昧,其性情论可与公安派性灵论画等号^[21]。而通过考察李氏集序的写作场景,可知其对公安派的称赏,基本均出现于为楚人作序的文本情境之中,如《郭原性诗序》云:“迩日公安、江陵诸君子称诗,能于《三百篇》外自操机杼,无论汉魏、六朝、三唐,今得原性羽翼接响,维楚有材,诎不信哉!”^[9](8册,P481)其目的是褒扬集作者或建构楚地文学,公安诸子并不位于论述中心。可见李氏的多变态度与宽松立场,极有可能是在不同应酬语境下的应变策略。

又如李氏对宋元诗的态度,有研究认为其对宋诗的看法已有所改变,拓展着复古诗学的接受视野^[21];有学者以《宋元诗序》为据,指出李氏借《诗经》提升宋元诗价值,对其态度相对缓和^[11](P348-350)。事实上,此序中以《诗经》论宋元诗的行为,只是其运用构件的惯常手法:于序文写法而言,《诗经》构件在整篇文章中起转折作用,便于后文深入展开;从人情交际来看,此文目的是褒扬潘是仁编辑《宋元名家诗选》的举动,故对宋元诗须有一定的认可。但序中基于“陈诗观风”说的认可显然缺乏力度,只是在肯定其具有反映历史的价值,而并没有深入揭示其作为诗歌艺术本身的价值。这种论说策略,甚至用到任何对象上均无不合适。而翻检李氏文集,可知其对宋元诗以排斥为主,整体评价甚低^[19](P53)。当然,借由是序,我们或可认为李氏排击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从应酬书写的角度来看,这仅是在人情交际、写作方式方面的策略性回避,这种缓和态度自然会大打折扣,其真实想法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最后,李氏关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常是应酬式的场面话,或径将自身文学理想范式投射于集作

者,而并未考虑所序对象与该评价的契合程度。其序跋以称扬赞誉为主调,“比肩风雅”等是其评鹭作品的常用术语。这类论断与实际文本之间有时存在显著差距,我们不可全然采信,应秉持审慎辩证的态度予以接受。在此,可以著名的诗学专著《诗源辩体》为例观之。一介布衣许学夷,曾辗转通过数位友人求序于李维桢,为的是让《辩体》显扬于世。“三十年中,余两度澄江,不闻其邑有许伯清者,隐而好学,未及从游,而伯清雅知有余。余友吴伯乾,亦不识伯清何状,遥闻声而相慕也。一日,伯清介其友袁尔振贻书伯乾,俾属余为《诗源辩体》序。”^[9](8册,P227)可见二人交情尚浅,李氏亦并未与之会面,乞序请求系通过数位中间人转递,故其序大量运用《诗经》构件敷衍成篇,大谈诗歌的“源流正变”“政教兴衰”,以颇为空泛的话语褒扬之。但许氏以谨慎严肃的态度对待凝结着毕生心血的成果,在刻书时并未采纳此序,其自序解释道:

既而吴伯乾与予相慕,为予曹丘,壬子夏,挟予书往白门,乞李本宁先生序文。时先生家政为烦,宾客旁午,未能竟览予书,故文虽多誉,而予之要旨实有未发。^[22](P4001)

其后又云:

李本宁论诗,散见其集诸序中,其持论多出于正。万历壬子,予《诗源》稍成,新安吴伯乾为予索本宁序。时本宁侨居秣陵,宾客旁午,而予又未有重名,公意忽之。故其文多不相关,且以文中子、刘迅编诗况予,则道途迥别。后湖海诸公多道及予,公始竟览予书,悔之,然其集已行,无从更定,要亦不足为公累也。^[22](P3934)

许氏之所以弃用该序,系因其空而不切、偏离主旨,未能真正把握《辩体》精要,甚或怀疑李氏未曾细读全书。尤其是以文中子、刘迅编诗作比,直接被许氏视作“道途迥别”。针对此,不妨再细观李序:

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情性。情性,古今人无二,安得亡?”故河汾有《续经》……刘迅《说诗》三千言,言诗者尚之。取《房中乐》至《临春》《少年子》之类以拟《雅》,取《巴俞歌》至《淡容娘》之类以拟《风》,夫亦河汾氏意耳。……伯清此编,继刘、王而述之,自有取尔也。其说云何?孔门惟子贡、子夏告往知来,可与言《诗》……伯清集诸家说,破除偏见,庶几孔孟遗法。^[9](8册,P228)

其中,王通采晋至隋的乐府诗编成总集《续诗》,刘迅取汉以来乐府诗接续风雅而成《诗说》,二书均祖述《诗经》、赓续《大序》以来的风教传统,主要以诗歌流变观察政教兴衰,从政治教化的角度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但许氏秉持诗家本位的眼光就诗论诗,《辩体》一书非关理学,宗旨是探究作为审美文体的诗歌之源流发展与体制正变,并非翼经之作。李氏以儒者著作比拟《辩体》,在核心价值上出现偏差与误解,这正是许氏所谓的“道途迥别”。总之,李氏此序显系借用现成《诗经》构件来搭建宏大叙事,意图拔高所序对象的政教价值。单看此文或许并无特殊之处,但在系统梳理李氏集序和构件运用情况后,便不难发现这是相当常见的程式化写作,乃其序文撰构的一贯套路。若后人在评价《辩体》的特征及地位时,偏信李氏的应酬文字并奉作定评,则会以并不恰当的前人著作来比附此书,甚至将研究焦点引向正统儒家诗论的阐释路径——而这恰非《辩体》的核心旨趣,亦有违许学夷的著述本意。

四、结 语

事实上,普通文人写作中对《诗经》的运用,多停留于表层化的引证或活套。李维桢文中的《诗经》构件,无论在出现频率、运用深度还是文本功能上,均有显著超越。可见作为经典的《诗经》已完全进入李氏的知识世界,并深刻影响着其思维方式与写作实践。故其所撰序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文本面貌:《诗

经》赋予其集序以历史纵深感,使得当代与三代的文学典范相承接,形成虚实交映的艺术效果;《诗经》学知识则给予普通文本以经典光泽,不仅增强文章的知识密度并提升思想层次,亦赋予其典雅醇厚的整体风格。《诗经》构件成为李氏文章写作中具有辨识度的修辞特征,能自然融入序文整体脉络,从形式到内容层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文章结构方面,构件在集序中位置、组合的不同,其功用亦各有差异。李氏利用构件完成序文入题、展开、转折、总结、呼应等设计,并以之不断驱动思绪,让论说得以继续铺展开来,使文章结构臻于完善。《诗经》本身的经典性和话题性,造就了其在集序撰构方面无可比拟的地位,特别是在写作遇阻时,其他类型的知识难以像《诗经》一样具有解决问题的权威性,无法在行文诸多环节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凭借对《诗经》构件的娴熟运用,其序文的结构形态亦呈现出超越一般模式的丰富性。

在诗学主张方面,若从诗学史层面加以观察,李氏的文学见解在历来论家的主张中并不鲜见,其所陈述的理论本身未必有多少新异之处,更多体现的是诗学领域已经达成的共识。但大量借用《诗经》构件来表达诗学观念,正是其独特之处。其文学观借助《诗经》得以顺利铺展,而《诗经》亦反过来强化其既有主张,甚至催生出新的论述方向。一方面,《诗经》具有丰厚且自成体系的阐释传统,其自身既构成知识资源和理论渊薮,亦成为李氏捭阖行文的思想源泉和灵感所在,他无论从何角度切入,似乎总能从中觅得论点论据与权威合法的言说保障,其诗论亦由此获得儒家学理的坚实支撑。另一方面,与结构上驱动成文相似,构件在观念层面亦推动着诗学理论的展开和深入,李氏在使用《诗经》过程中得以不断充实自身文学理论。不排除某些新观点,正是其在琢磨《诗经》、运用构件写作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完善的,《诗经》在顺利推演理论、丰富思想内涵等方面显然亦有能动作用。

然而,在人情应酬盛行的文化氛围中,构件所承载的文学信息,既附着于相关群体共享的公共知识与话语体系,也受限于应酬语境下书写者本人的撰文心理和交际动机。构件的程式化组装和集序的批量化生产,消解了李维桢文学活动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其集序中某些论评亦由此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这提醒着近世文学的研究,须警惕方法论上的惰性,不宜完全封闭地讨论文本自身,应还原至应酬的历史语境之中,不忽视所谓的交际诗学,应当展开精细化、情境化的考察。在利用序跋阐释作者诗学观念之前,要善于推敲其文本语境和社交语境,进行大量的甄别与提纯工作,审慎对待其作为研究材料时的可靠性,注重文献的生成背景和适用限度。进而言之,就文体学的研究来说,在《诗经》之外,研究者或许可以梳理出更多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文本构件;从宏观上归纳明人集序写作的内在规律,探究序文的知识要素构成;不忽视诸多看似重复的语句或程式化论述,从材料“说了什么”的表象走进“因何说”“如何说”的真相,抉发其背后深刻的书写动机与文化意涵,回归真实的历史语境,追溯原生的文学现场。

参考文献

- [1] 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钟晓青、陈芳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2] 徐雁平.“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成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以明清集序为研究范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 [3] 王润英.梓而有序:明代书序文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4] 颜子楠.模件化的创造力:以高启的咏物律诗为例.励耘学刊,2021,(2).
- [5] 徐雁平.清代用《诗》与集序的“驱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 [6] 周荣.朱熹《诗集传》在明代的衍生及其学术意义.文献,2024,(4).
- [7] 叶晔.材料的声音: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选材策略.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 [8] 周荣.《诗经》学知识与明人的文学实践——以陈子龙为中心.人文论丛,2025,(1).
- [9]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明别集丛刊:第4辑.合肥:黄山书社,2016.
- [10] 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胡秋蕾、王宇根、田晓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11] 鲁茜.李维桢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
- [12] 郑利华.明代诗学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 [13] 邓稳. 屈赋源起《诗经》论质疑. 中国楚辞学, 2019, (30).
- [14] 郑志强, 周颖. 《周南》、《召南》之“南”正义——兼论二《南》与“楚风”的关系. 中州学刊, 2004, (6).
- [15] 唐顺之集. 马美信、黄毅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 [16] 明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7] 孙瑞曦. 李维桢书序文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 [18] 王逊, 周群. 论李维桢诗论的“折衷”特色. 长江论坛, 2009, (4).
- [19] 谢旻琪. 李维桢文学思想研究. 新北: 淡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20] 陈文新. 信心论与信古论在晚明融合的学理依据及其历程. 山东社会科学, 2002, (2).
- [21] 查清华. 李维桢对明代格调论的突破与创新. 中国韵文学刊, 2000, (1).
- [22] 许学夷. 诗源辩体//陈广宏、侯荣川. 明人诗话要籍汇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Shijing Modules and Occasional Writing in Li Weizhen's Prefaces to Collected Works

Zhou Ro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Li Weizhen's prefaces to collected works frequently contain discrete textual units that repeatedly invoke knowledge related to *the Shijing* (《诗经》, *The Book of Poetry*) and follow relatively stable formulaic patterns, which can be defined as "*Shijing* modules". Li's experience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for which *the Shijing* served as a foundational canonical texts, coupled with his scholarly interests in it, endowed him with a profound command of it, enabling him to efficiently produce competent prefaces upon request on social occasions. Li incorporated his knowledge of *Shijing* as a standardized writing device into the textual fabric of his prefaces, with such modules appearing at the beginning, middle, or end of a piece, or across multiple structural positions. Interwoven with other modules, these elements serve to introduce topics, elaborate arguments, facilitate transitions, wrap up discourses, and form rhetorical resonances, thereby significantly shaping the prefaces' compositional patterns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Li frequently employs various *Shijing* modules to formulate and consolidate his core poetic and literary thoughts, primarily embodied his archaist poetics, the theory of poetry as the expression of *xingqing* (性情, nature and emotion),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Chu-region literature. Nevertheless, the formulaic assembly of these textual modules and the prolific, routinized production of his prefaces undermined the rigor and authenticity of his literary critiques. Accordingly, the literary observations or critical judgments presented in his prefaces should be treated cautiously and dialectically. This case study suggests that scholarly inquiries into late imperial poetry and prose must attend to the knowledge systems and the modular composition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literati writing, contextualize works within the cultural milieu of social exchange, and acknowledge the formative backgrounds and applicable boundaries of documentary materials, rather than overlooking such critical dimensions.

Key words Li Weizhen's prefaces to collected works; *Shijing* modules; Ming dynasty poetics; social context; stylistics

■ 作者简介 周 荣, 武汉大学文学院弘毅博士后, 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何坤翁